

2011-2015

研究述评

崔云伟◎著

通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获得2017年度山东艺术学院科研成果出版基金资助

2011-2015

研究述评

崔云伟◎著

音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2015：鲁迅研究述评 / 崔云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7-5203-1352-0

I. ①2… II. ①崔… III. ①鲁迅 (1881—1936)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47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74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2011 年鲁迅研究述评	(1)
一 鲁迅作品研究	(2)
二 鲁迅思想研究	(14)
三 鲁迅生平研究	(29)
四 鲁迅与艺术研究	(31)
五 鲁迅与教学研究	(33)
六 鲁迅与学术研究	(34)
七 鲁迅与翻译研究	(36)
八 鲁迅史料研究	(37)
九 鲁迅研究之研究	(38)
第二章 2012 年鲁迅研究述评	(48)
一 鲁迅作品研究	(48)
二 鲁迅思想研究	(60)
三 鲁迅生平研究	(76)
四 鲁迅与翻译研究	(78)
五 鲁迅与学术研究	(80)
六 鲁迅与教学研究	(81)
七 鲁迅手稿研究	(82)
八 鲁迅与美术研究	(83)
九 鲁迅资料研究	(84)

十 鲁迅研究之研究	(86)
第三章 2013 年鲁迅研究述评	(90)
一 鲁迅作品研究	(90)
二 鲁迅思想研究	(102)
三 鲁迅生平研究	(118)
四 鲁迅与翻译研究	(121)
五 鲁迅与学术研究	(122)
六 鲁迅与教学研究	(123)
七 鲁迅与美术研究	(125)
八 鲁迅著作出版研究	(127)
九 鲁迅藏书研究	(127)
十 鲁迅研究之研究	(128)
第四章 2014 年鲁迅研究述评	(131)
一 鲁迅作品研究	(131)
二 鲁迅思想研究	(143)
三 鲁迅生平研究	(154)
四 鲁迅与学术研究	(160)
五 鲁迅与艺术研究	(162)
六 鲁迅研究之研究	(165)
第五章 2015 年鲁迅研究述评	(170)
一 鲁迅作品研究	(170)
二 鲁迅思想研究	(178)
三 鲁迅史料研究	(190)
四 鲁迅与学术研究	(192)
五 鲁迅与教学研究	(194)
六 鲁迅与翻译研究	(194)

七 鲁迅遗产研究	(195)
八 鲁迅研究之研究	(196)
附录一 2011—2015 年鲁迅研究中的争鸣	(199)
附录二 “70 后” 看 “30 后”：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和盲点 ——由《冯光廉学术自选集》所想到的	(228)
附录三 一部致力于现象学还原的体大思精之作 ——评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1872—1949 文学期刊 信息总汇》	(235)
附录四 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再体认 ——评崔云伟《现代中国文学史论》	(240)
后记	(247)

第一章

2011 年鲁迅研究述评

2011 年是鲁迅诞辰 130 周年、逝世 75 周年。为了纪念这一盛事，北京、上海、天津、绍兴等地纷纷召开了隆重会议，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来自海内外的众多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纷纷与会，围绕各项议题展开了自由而热烈的探讨。北京会议由刘云山讲话，杨阳、孙郁、梅圣莹作代表发言。天津会议从鲁迅本体、鲁迅周边关系和鲁迅学术史等不同层面对于鲁迅世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绍兴会议的主题是鲁迅经典文本解读、鲁迅与现代中国、鲁迅的世界意义及其他，上海会议的中心议题则是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会议刊印了论文集，集中登载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鲁迅研究月刊》《上海鲁迅研究》《绍兴鲁迅研究》《民族魂》（前身《广东鲁迅世界》）等专门的鲁迅研究刊物亦持续发挥了重镇和领军作用。除此之外，其他众多学术刊物也不甘寂寞，趁势而上，不约而同开辟了各种鲁迅纪念专栏和纪念专题。据不完全统计，开辟“纪念鲁迅诞辰 130 周年”专栏的报纸杂志主要有：《武汉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现代中文学刊》2011 年第 3 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 年第 5 期、《学术月刊》2011 年第 11 期（该刊所设“不能忘却的纪念”5 篇笔谈，实际即是对鲁迅诞辰的纪念）、《读书》2011 年第 9 期、《滨州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文艺报》2011 年 9 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 9 月 20 日等。虽不标明纪念鲁迅诞辰，但实际上亦开设了鲁迅研究专题的刊物也多不胜数，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 年第 8 期、《东岳论丛》2011 年第 8 期、《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等。所有这些鲁迅研究刊物、鲁迅纪念专栏、鲁迅会议论文集，加上在本年度出版的一大批鲁迅研究专著、鲁迅作品集和在为数更多的学术期刊中出现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都汇集起来共同形成了一个异彩纷呈、创意不断的局面，共同把 2011 年的鲁迅研究推向了一个新

的高潮。

一 鲁迅作品研究

1. 鲁迅小说研究

主要包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研究。

与《呐喊》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①（以下简称《瞬间》）试图对《阿Q正传》做出新的阅读。该文洋洋五万余言，其主要观点有：第一，《阿Q正传》的叙述中包含着两个国民性的对话：一个是鲁迅的叙述本身体现出的国民性，另一个是作为反思和再现对象的国民性。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不是单面的，将自身作为审判对象也意味着自身已经具备了审判者的潜能。这就是国民性的两重性。《阿Q正传》将国民性的寓言置于“革命”与“变动”的条件之下，从而也暗示了这种自己反对自己的行动与“事件”的关联。第二，辛亥革命提供了阿Q转向革命的契机，但未能促发阿Q的内部抗争或挣扎。因此，“革命”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的瞬间存在于阿Q的生命之中。在阿Q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纠缠——作为秩序维护者和本能的抵抗者的共在——正是鲁迅对革命的探索的成果。这个探索的核心就是谁是革命主体这一问题。鲁迅并没有看低阿Q的革命本能，相反，他揭示了这个本能被“意识”不断压抑和转化的命运。第三，在阿Q的生命中，存在着六个卑微的瞬间，分别是：“失败的苦痛”与“无可适从”；性与饥饿；“无聊”；死。鲁迅对阿Q生命中的这些隐秘瞬间的描写，是对“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可能性的发掘；他对本能、直觉的观察，也是对于超越外界注视的目光是否能够产生新的意识的探索。失败感、无所适从、无聊、恐惧和自我的片刻丧失，在这里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Q是否会成为革命党这一问题。鲁迅对于革命的描述，革命和不准革命，造反的本能与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的暗示，都在这样的细节和叙述里找到了根据。《阿Q正传》中的六个瞬间，也是阿Q“觉醒”的契机。在理解了这些瞬间之后，我们重读小说的小序，以及作者关

^①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于阿 Q 不能入传四个理由,对于这篇小说就会产生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开放的经典,与其说《阿 Q 正传》创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不如说提示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这些契机正是无数中国人最终会参与到革命中来的预言,正是这些卑微的瞬间,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阿 Q 镌刻在空洞的深处,就像寄居于我们身体中的“鬼”一样,难以驱除。第四,在《阿 Q 正传》中,鲁迅试图抓住阿 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通过对精神胜利法的诊断和展示,激发人们“向下超越”——向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向着非历史的领域超越。革命不可能停留在直觉和本能的范畴里,但直觉和本能不但透露了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关系,而且也直白地表达了改变这一关系的愿望。因此,不是向上超越,即摆脱本能、直觉,进入历史的谱系,而是向下超越,潜入鬼的世界,深化和穿越本能和直觉,获得对于被历史谱系所压抑的谱系的把握,进而展现世界的总体性。在“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的世界里,如果说《阿 Q 正传》是对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一个探索,那么,这个开端也就存在于向下超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中——这是生命的完成,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阿 Q 正传》是中国革命开端时代的寓言。

《瞬间》发表以后,谭桂林^①随即与之展开商榷,认为《瞬间》无论是在对阿 Q 的“革命性”的评价上,还是在对《阿 Q 正传》这一经典文本的解读上,都存在着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从鲁迅研究史的角度看,《瞬间》对阿 Q “革命性”的内容与意义的发掘,其深广程度并没有超越当年陈涌的论述,《瞬间》的意义在于它从欲望、本能这种个体的深层心理因素探讨和分析了阿 Q “革命性”的内在逻辑。在《阿 Q 正传》中,阿 Q 的欲望、本能与直觉始终是与他的精神胜利法联系在一起的,是精神胜利法之所以能够成为胜利法则的事实依据。鲁迅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欲望、本能和直觉的精神化解,突出国民灵魂中的精神胜利法的无所不能。鲁迅对于阿 Q 的欲望、本能和直觉体现出的所谓“革命性”始终保持的是一种清醒而深刻的批判精神。针对汪晖“向下超越”的观点,谭桂林认为,这个论断本身即已包含着无法圆成的矛盾性,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诞生”只是汪晖自己的哲学沉思的结果,而与鲁迅无关,不应该以“鲁迅试图”的表达方式,嫁接到鲁迅的头上。在谭桂林看来,鲁迅笔下的革命主要有两种:一是

^① 谭桂林:《如何评价“阿 Q 式的革命”并与汪晖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2011 年第 10 期。

民族国家现实生存中实际发生了的革命事件，二是鲁迅心目中对于革命的一个纯粹理想形式。鲁迅心目中的辛亥革命应是一场“人性革命”，而非如汪晖所言的“道德革命”。“人性革命”是一个永远的、不断的革命过程，它不会也不可能通过某种具体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鲁迅的“人性革命”理念乃是一种纯粹的革命理念，不是任何现实的具体的革命事件可以取代和圆成的。最后，针对新左翼文学思潮对于鲁迅资源的利用问题，谭桂林指出：往往对鲁迅的思想材料越是熟悉，对鲁迅的理解越是深刻，对鲁迅的情感与人格的联系越是真挚丰富，而努力将鲁迅的思想纳入到自己的思维轨迹中时，这种鲁迅资源的利用也就距离鲁迅越远，对于复杂而丰满的鲁迅思想的简约与遮蔽也就越加显著。这显然是针对《瞬间》而言的。

吴康《“怕”与“畏”的思与诗——〈狂人日记〉的海德格尔式思考》^①认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以文学的或诗的书写印证了海德格尔关于怕与畏的思考。小说始于狂人就近生存的莫名的怕，就怕而展开生存之思，思及世人的“吃人”心思，思及一部民族仁义道德遮蔽下的“吃人”历史，思及这部历史残忍的吃人方式。这样就使狂人深陷于“无”的存在境域中了，亦使狂人于无中看到了“有”，看到了本已能在的“真的人”，从而发出他朝向现代的“呐喊”来。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畏的展开状态。吴康先生自21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鲁迅与存在主义研究，相继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并于2010年推出力作：《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②，笔者曾在历年的鲁迅研究综述中重点评述。先生积淀沉实、学养丰富，无奈天妒英才，竟因积劳成疾，遽尔英年早逝，此诚鲁迅研究界一重大损失。谨致诚挚敬意，唯愿安息。^③

对《狂人日记》做出解读的还有张直心、朱羽^④等。

李云雷《〈故乡〉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乡愁”》^⑤指出，《故乡》表达

① 吴康：《“怕”与“畏”的思与诗——〈狂人日记〉的海德格尔式思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② 吴康：《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吴康先生著述颇多，具体参见张文初《入荒寒寂寞之境，招浩歌狂热之魂——吴康著述论评》，《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④ 张直心：《〈狂人日记〉：鲁迅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互阐》，《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朱羽：《革命、寓言与历史意识——论作为现代文学“起源”的〈狂人日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⑤ 李云雷：《〈故乡〉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乡愁”》，《文艺报》2011年9月20日第6版。

了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经验。在这篇小说中，鲁迅表达了启蒙知识分子与乡村的疏离感。这种疏离同时也是一种新知识在面对旧世界时的态度：一个旧日熟悉的世界，在一种新眼光的注视下，呈现出了它黯淡乃至黑暗的一面，但同时他又不能决绝地弃之而去。对于我们来说，《故乡》是一种永恒的乡愁，它凝聚了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故乡时的复杂情感与内心的分裂，写出了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在今天我们需要时时凝望《故乡》，也需要超越《故乡》，将我们难以描述的“乡愁”铭刻在记忆与文字中。

与《彷徨》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肥皂》《离婚》。

赵牧^①在重读《肥皂》时指出，鲁迅在《肥皂》中不仅透过情色想象将四铭描绘成一个伪君子，而且在家庭闹剧中暴露了他置身其中的权力秩序。四铭和太太分属两套几乎完全不相兼容的话语体系，只在宏大政治或道德话语层面，他才有资格做太太的主导，而这时太太的随声附和以及漫不经心，看起来维护了他的权威，却悄然完成了对其权威的消解与颠覆。道德家的激情和牢骚家的不平一遇到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的反诘就变得岌岌可危，由此导致四铭在宏大话语掩盖下的淫心终于现出原形，他的自以为在家庭权力秩序中的优越地位及有关国计民生和文化道德的迂阔的议论也在无形中受到揶揄和嘲讽。

在近代中国农村的基层，士绅们是乡村权力的实际掌控者，也是连接民间和国家权力体系的枢纽。陈婵^②认为，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为我们呈现了众多中国近代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乡村个人和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空间，包括社庙、士绅的客厅、茶馆、酒店、街道和航船等。小说《离婚》，把一个普通农妇和丈夫的离婚事件，从家庭内部的私人空间移放到士绅的客厅这一乡村公共权力空间进行展现，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乡村基层权力谱系的结构及其本质特征。袁红涛^③亦认为，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

① 赵牧：《情色想象与权力秩序——重读鲁迅的〈肥皂〉》，《东岳论丛》2011年第1期。

② 陈婵：《〈离婚〉：关于近代乡村基层权力空间的寓言》，《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③ 袁红涛：《绅权与中国乡土社会：鲁迅〈离婚〉的一种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与《故事新编》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铸剑》《起死》。

古代历史和传说经后世改编成“演义”、历史小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传统，至今也不例外。然而，古代历史和传说究竟怎样改编？改编后作品的性质是否改变？其意义在改编中如何生成？尚需一套阐述方法。蒋济永^①通过对《铸剑》文本的“改编学”分析，发现鲁迅在其中倾注的“创新”意义和价值体现在：（1）作品结构由原来以故事情节为核心的叙事向以人物塑造为核心的叙事转变；（2）由传奇故事变成了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核心的现代小说；（3）使复仇具有了正当性；（4）故事由单一的传奇性叙述变成了既符合生活逻辑又保留一定传奇性，还带着诙谐、荒诞性的多重叙事；（5）小说的意义由单一地表现复仇变成了使复仇兼具悲壮性、崇高性、诡异性、滑稽性、荒诞性的多重意义表达，其核心是表达人生悲壮的复仇行动及其过后遭遇的尴尬和荒诞感。简而言之，《铸剑》将一个传奇故事变成了现代荒诞小说。该文以《铸剑》为个案探讨“鲁迅是怎样改编历史故事和传说”，既为《新编》中其他作品提供了一个“改编学”的理解视角，也为《新编》以外的历史小说和剧本的阐释提供了某些方法启示。

长期以来，《起死》被简化为鲁迅对于庄子相对主义的批判。王学谦^②却认为，鲁迅小说《起死》将庄子分为两半：一个是庸俗庄子，另一个是狂人庄子。鲁迅批判庸俗庄子而继承了狂人庄子的精神。小说中道士庄子即是庸俗庄子的化身，汉子则是狂人庄子的隐喻。《起死》没有否定相对主义，只是否定了庸俗的相对主义。鲁迅以自己的视角对庄子进行了重新解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道家文化的取舍。

本年度还有一批论文是对鲁迅小说的整体透视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有：

曹禧修《论鲁迅小说多重否定结构》^③从叙事学视角出发，认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定位决定了“否定”是知识分子鲁迅的主导思维，也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主导思维。鲁迅小说通常有多个“否定者”的角色，每一个否定者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自己周边的物事与人；“螳螂捕蝉，黄

① 蒋济永：《传奇故事的改写与现代小说的形成——从“改编学”看〈铸剑〉的“故事”构造与意义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② 王学谦：《狂人庄子对庸俗庄子的颠覆——鲁迅〈起死〉对庄子精神的批判与继承》，《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③ 曹禧修：《论鲁迅小说多重否定结构》，《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雀在后”，否定者背后还有否定者，给否定者以再否定，由此形成多层或多重否定性叙事结构；“否定之否定”叙事结构不仅是鲁迅小说中最突出的结构方式，也是其小说中远比“看/被看”更普遍的结构方式。否定者恰恰遭遇着否定者的否定，批判者同时也站立在被批判者的行列中，鲁迅小说就是这样在否定之否定结构中把叙事导向深入，抵达意义的深度。

刘长华《自我认知的难题》^①致力于鲁迅小说中的故人相逢叙事，认为从中展示了一种自我认知的难题。这种难题是鲁迅在小说创作中立足国民性批判立场告诫国人对自我认识不清的基点或根源。鲁迅是恒持着“自我认知是难题”的世界观的，正是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之下鲁迅才喊出“认识你自己”，鲁迅的“认识你自己”恰好是反对人们对自我的认识过于简单化、模式化、固定化处理。这种“自我认知的难题”与鲁迅“绝望的反抗”哲学构成了相通。“自我认知是难的”也就是“绝望”的，是本体的；但是还得“认识你自己”，便是“绝望的反抗”，所以“自我认识的难题”是“绝望的反抗”哲学的丰盈与意象化之一。

对鲁迅小说进行整体透视的还有朱崇科^②等。

2. 《野草》研究

张鑫^③细致考索了《野草》的语言节奏与“意蕴节奏”，发现长短不一的语词或句子的安排穿插，排比、层递、顶真、回环、设问、反问、对偶、反复等修辞格的交叉运用，是《野草》形成语言节奏经常调动的手法。《野草》节奏的魅力，更主要隐藏在与意义相关的主题变奏的变幻中，即所谓“意蕴节奏”中。以论者对《希望》的解读为例。《希望》的主题有四：A. “寻找‘身外的青春’”；B. “发现‘身外的青春’并不存在”；C. “选择‘肉薄’”和D.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的核心主题，是通过诸多副主题的变奏、反复，以及这些变奏、反复的副主题的交叉否定、相互超越而推动的，并通过一个异质主题的突然切入，最终促成的。短短的一篇文章，既涉及各自副主题的反复、变奏和推动，又涉及诸多副主题的相互交叉、否定和推动，在相互否定和推动中形成一种新的合作力量——一种类似“主题束”的陌生动力，从此，各主题的反复和变奏，同时又是

① 刘长华：《自我认知的难题：鲁迅小说与故人相逢叙事》，《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5期。

② 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贱民话语》，《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③ 张鑫：《论〈野草〉的语言节奏与“意蕴节奏”》，《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

“主题束”的反复和变奏，最后，又通过节外生枝的新主题的嵌入，彻底颠覆了它，从而推出文章的核心主题。文章条分缕析，论述精妙，剖析合理，为近年来《野草》文本分析中的优异之作。

李国华^①将《野草》视为梦与忆之诗，认为在《野草》中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原型结构，这种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圆环状态，即：当下——诱引——梦（忆）——诱引——当下。《野草》内部各文本基本上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明显的圆环结构，在时序及事序上均有整饬的表现。这种梦（忆）诗学展示了《野草》与佛经寓言的亲缘关系，与中国古典诗词文章的血脉关系，以及与普鲁斯特《追忆似水流年》极其一致的叙事结构。鲁迅正是以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为营养，才完成其以梦与忆为羽裳、表“难以直说”之苦衷的杰作《野草》的。

吴翔宇^②关注的是《野草》中的“名”与“实”。他发现，在《野草》中，“名”如“鬼打墙”一般弥散成“无物之阵”。“无主名杀人团”和“有主名假象”导致了“实”的本质被遮蔽和当下行动的缺席。通过“无名”身份与“共名”效应的比照、“有名”身份与“正名”困境的反讽等叙事方式的建构，“实”的本质被还原。鲁迅秉持弃“名”崇“实”的现世情怀，以“执着现在”为内核，强调当下之行，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容忽略的。该文熟识现象学哲学要义，将之和《野草》文本巧妙结合，丝丝入扣，阐释深邃，合情入理，力透文本。

张洁宇^③则从“自画像”的角度重新阐释了鲁迅的《野草》，讨论了鲁迅是如何“写出自己”，如何在审视和反思中，创造出一个供“审视”的对象的。可以说，《野草》的写作，不是“表达”已在之我，也不是写给身外的“审视者”，而是在包含上述两个因素的同时，“画出”一个作为图像的“我”。“自画像”的阐释视野可以包含这三个要素，并着重讨论其中的第三个，也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我”。从艺术的角度说，这一阐释也突破了以往《野草》研究中只考察鲁迅“自我”的方法，更涉及鲁迅的“写作”的存在。

多年来，李玉明一直视《野草》研究为“自己的园地”，在此勤耕不

① 李国华：《〈野草〉：梦与忆之诗》，《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5期。

② 吴翔宇：《论〈野草〉名实空间的文化意义》，《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张洁宇：《审视，并被审视——作为鲁迅“自画像”的〈野草〉》，《文艺研究》2011年第12期。后收入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辍，并硕果累累。本年度再度捧出系列力作。

其《〈腊叶〉：为爱我者而唱的歌》^①认为，《腊叶》所呈现的鲁迅心境是沉静的，这一点与《野草》其他诗篇不同。“病叶”是鲁迅身体境况的自喻，它使鲁迅再一次真切地目睹了“死”；然而，面对着“死”的却是一颗平和的、充盈着爱的心。同《野草》其他篇章一样，《腊叶》同样是鲁迅对自我及其心态的一次调整，同样是鲁迅将解剖的利刃刺向自身的结果。它表明，鲁迅能够跨越自我个人的悲戚，在一种悲剧性的历史承担中开始向现实从而也是向自身挑战。

其《〈风筝〉：寻找精神家园》^②认为，《风筝》所揭示的并非一般研究者认为的“负疚感”。它所暗示的鲁迅的情感和态度，是珍藏于鲁迅心底的对过去纯真时光的眷爱，对充满着梦幻和痴情的童稚天性，以及人们最正当的追求行为与合理发展的肯定，扩而大之，是对一切真正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的肯定。再深入一步，则豁然发现：失去家园、回眸家园、寻找家园，正是构成《风筝》抒情方式的一个内在张力，从中显现的同样是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哲学。

与对《风筝》的解读相类似，李玉明将《好的故事》解读为心灵上的“还乡”^③，认为《好的故事》是一个幻境，却浸渍着诗人故乡的色泽，它是鲁迅渴求温暖和热情并以此抗衡内心世界中阴冷情绪的一次理想之旅、“回乡”之旅。

其《〈求乞者〉：先觉者的“罪感”》^④则指出，《求乞者》也是指向鲁迅自我的，而非对于外在的社会现象的批判。这个自我首先是一个现实生存者，一个束缚于历史和现实关系中的具体而卑微的“角色”，它源自鲁迅的原罪意识，是其对人（自我）的相对性有限性的体味。但是诗人又不甘于这种现实处境和现实角色，他以一种决绝的挑战姿态开始了某种“抵抗”，并力图在这种抵抗中把握自我及其存在之意义。

① 李玉明：《〈腊叶〉：为爱我者而唱的歌》，《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后收入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李玉明：《〈风筝〉：寻找精神家园》，《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后收入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李玉明：《〈好的故事〉：心灵上的“回乡”》，《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后收入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 李玉明：《〈求乞者〉：先觉者的“罪感”——鲁迅〈野草〉解读之一》，《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后收入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吕周聚^①认为《过客》是鲁迅在面临人生困境时所写下的一部具有象征意味的诗剧。它一方面表现出了鲁迅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感悟、看法及做法，具有鲁迅自己的深刻烙印，是鲁迅内心思想的真实展现；另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普遍启示意义，告诉人们在面临人生困境时应如何选择、如何去做。鲁迅是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出发，来思考人生的各种问题的，其所经历的现实人生困境，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现实人生困境。《过客》所指示的人生道路可能是最难走的一条，但却是最有意义的一条。我们无法期望、更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像过客那样忍受孤独、反抗绝望，但过客的精神与思想可以作为我们人生之路上的路标，可以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借鉴与启迪。

对《野草》做出解读的还有伍晓明、田建民、卢文婷^②等。

3.《朝花夕拾》研究

《藤野先生》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早在2006年就是一个论争的热点^③。本年度潘世圣^④再度发表文章，认为围绕鲁迅“弃医从文”的自身叙述，中日两国学界的“阅读”和“阐释”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竹内好提出“弃医从文”叙述中存在“传说化”倾向，具有某些“虚构”要素；这一思考路向延伸到其国语教科书，是将收录的《藤野先生》定位为“小说”。其间既有学术研究的“证真”“证伪”问题，更有文化传统、文学意识和思考路向的制约，比如日本独特的“私小说”观念。总之，中日研究者围绕《藤野先生》的分歧，除了事实认定以外，背后还潜藏着中日两国在文学文化观念以及思维逻辑上的差异。而且，日本学界自竹内好以来的意见和实践对中国的“鲁迅叙述”和“鲁迅阐释”也是具有良性刺激和启发意义的。

关于《五猖会》的创作主旨，人们往往将之看作封建教育对于儿童天

① 吕周聚：《忍受孤独，反抗绝望——〈过客〉对现实人生的启迪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

② 伍晓明：《我之由生向死与他人之无法感激的好意——重读鲁迅的〈过客〉》，《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6期。后收入伍晓明《文本之“间”：从孔子到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田建民：《先驱者孤傲而无奈的心态表露——鲁迅散文〈秋夜〉论析》，《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卢文婷：《破碎的身影：续写与对话——〈野草〉与德国浪漫主义》，《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③ 具体参见崔云伟、刘增人《2006年鲁迅研究综述》，《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9期。又见崔云伟、刘增人《2001—2010：鲁迅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175页。

④ 潘世圣：《事实·虚构·叙述——〈藤野先生〉阅读与日本的文化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性的压制和摧残。李宗刚^①却认为,《五猖会》通过对父权疆域的寓言化书写,反映了“子”被“父”驯化时的真实生存境遇,清晰地呈现了中国文化在传承中“父”规“子”循的基本情形,隐含着清末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代际冲突”是怎样孕育发生的,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该文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不仅细致剖析了鲁迅的《故乡》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而且详细解读了毛泽东、郭沫若、曹禺等人的与之相似的生活情境,借以构成一种参差的对照,互为镜像,相得益彰,从而使论证更为丰实饱满,结论也更为准确有力。

从后现代主义“互文性”理论出发,贵志浩^②发现《朝花夕拾》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文本,而是以回忆与现实的交织、叙述与随感的交融、引用与考据的互释形成的一种相互映射、彼此关联的开放性对话关系。《朝花夕拾》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形态的话语资源:叙述话语、批评话语和反思话语,与之相对应的是:回忆者鲁迅、革命者鲁迅和思想者鲁迅。从《小引》到《后记》的过程,正是一个回忆者鲁迅最终被革命者鲁迅和思想者鲁迅所替代的过程。《朝花夕拾》披着回忆的外衣,指涉着现实的世相,隐含着的却是沉重的反思。

4. 鲁迅杂文研究

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时,中国托派重要成员陈仲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对鲁迅反对“国防文学”表示敬意。当时鲁迅正重病在床,“一时颇虞奄忽”,冯雪峰即代笔替鲁迅写了一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对托派予以严厉抨击。那么,稍后从病中暂时清醒之后的鲁迅将以为何如呢?田刚^③认为,鲁迅对冯雪峰替自己代笔的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仅不满意,而且还不予承认。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对托派的忌讳,只是出于政治原则性的——当时他已经被共产党推举为文学上的精神领袖,在原则上他对托派不能不有所规避。而他之规避托派,主要还是不想让对手——“国防文学”派的周扬们抓住自己的辫子,从而在政治上陷自己于不利。而在私情上,尤其是在文学观念上,鲁迅未必会如那封答信中那样对托派持有那么大的恶感。因为托派的背后——不管是托洛斯基,还是陈独秀,毕竟都

① 李宗刚:《父权疆域的寓言化书写——鲁迅散文〈五猖会〉新解》,《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

② 贵志浩:《记忆遮蔽下的文化反思——〈朝花夕拾〉的互文性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4期。

③ 田刚:《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考辨》,《东岳论丛》2011年第8期。